

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

葉漢明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

近年來，婦女文化已成婦女研究及婦女史和文化史的熱門課題。婦女文化的獨特性和婦女在文化承傳中的角色愈來愈受重視，成爲多個學科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歷史學方面，婦女文化史行將成爲檢討史學傳統，引進新範式的一個研究領域。

一、文化史、新文化史與婦女研究

本來，十九世紀由Burckhardt帶起的「文化史運動」已對世界史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在觀念建構方面，這運動使西方「文化史之父」Voltaire所開創的學科進一步體系化，而人類文化的新陳代謝也成爲貫通總體世界史的觀念。在中國方面，「新史學」之父梁啓超在1936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可說是這個專史部門的奠基性著作⁽¹⁾。該書內容包括母系與父系，婚姻、家族與宗法、姓氏、階級、鄉治、都市等。差不多同時期出版文化史著作的有柳詒徵、陳登原、陳安仁等。其中陳安仁

(1) 雖然二十年代已有數種文化史著作面世，但梁氏所帶起的「新史學」運動影響深遠，一般人仍以他的文化史爲楷模。

的《中國近世文化史》更附有討論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部份，並嘗試建構一套各國文化演進互為因果、互相吸收融化以達世界化的系統圖式⁽²⁾。四十年代錢穆所撰的《中國文化史導論》，則特別指出中國為「舉世惟一的農耕和平文化最優秀之代表」，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如何更新，以及史學在闡明文化的複雜性、完整性、和發展性及「指陳中國文化的真相」方面所發揮的作用⁽³⁾。至於其他文化史著作，對文化史的概念和體系較少涉及，一般只接編寫有關家族、宗教、生活、風習、法制、教育、學術、文藝等屬於文化範疇的歷史內容，但偶爾也會出現專論婦女的篇章，如陳登原的《中國文化史》（1962）就有女性中心與男子社會、南北朝的婦女等章節，王德華的《中國文化史略》（1953）也有婦女之貞操問題與離婚問題一節。在「文化熱」的影響下，大陸最近出版的文化史如譚家健的《中國文化史概要》（1988），則只專注於典章制度、文學、哲學、家教、藝術等較狹義的文化史課題⁽⁴⁾。

目前，中外都響起了更新文化史觀念和擴大文化史領域的呼聲。中西學者不約而同地認為文化史不僅要研究文化的客觀表現，即人類所用的象徵符號、所創制的各種文化產品等；而且要研究文化的主體——人自身的人生觀、思想感情、價值意識、精神生活等，以及人在創造文化時不斷被塑造的過程，同時還要研究主體與客體間交相滲透的現象（Link et al., 1989: 3; 馮, 1989: 3）。

(2) 見陳安仁，1939年三版的緒論。陳氏另著有《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演進史觀》等，均在四十年代出版。

(3) 見錢書弁言部分（錢，1957：4~6）。

(4) 參見湯一介為該書寫的序。

一方面，中國學者建議對文化史的有關內容講求其間的有機聯繫，以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要研究各種文化的特性、交流、和融合，及文化的傳播、記錄、認知、教化、凝聚、變革、統攝等功能；以及要從比較的角度探討各種人類文化的特徵和影響（于，1989：162~168）。另一方面，西方新近興起的「新文化史」浪潮，也針對過往文化史的狹隘性，批判只重視菁英文化的研究，鼓吹繼續開拓大眾文化的領域；而當代法國「年鑑學派」的「心態史」研究，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工人文化的探討，也發揮了極大的刺激作用。

「心態史」的研究者透過破譯法庭訴訟記錄和證供，以至節慶、禮儀、歌謠等語言或姿態符號的意義，推論出民衆對宗教、巫術、神話、愛情、性行為、死亡等的態度，進而發掘他們的潛意識。這種嶄新的撰史方法使通俗文化及社會下層人民生活和思想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也使人類的文化產物得到重新處理(Revel, 1989: 6)。

英國方面，以 E. P. Thompson 為代表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勞工史研究中的文化和思想因素，強調工人階級的形成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更是一個文化過程。繼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hompson, 1963) 後，Thompson 寫了不少描述工人社群活動、節慶、消遣方式，對時間的觀念等著作，從工人的日常生活去揭示工人階級的文化。影響所及，美國等地興起了「新勞工史學」，強調對工人的主動性和文化領域的重視，分析工人獨特的價值觀系統和文化的傳承方式。

簡言之，語言、行動等符號成為新文化史家的重要分析和詮釋工具。在美國，不少社會史學者也著重文化交流的載體如書刊

、音樂、和大眾傳媒的作用方式，並從作者、出版商、印發人、書商、圖書館、以至讀者和觀眾的交流網絡中考察有關符號交換的問題(楊豫，1989：34)。

提到符號的象徵和含義，當然不能忽略當代法國思想家M. Foucault 的影響力。他也是「新文化史」的理論支柱之一。Foucault雖非專業史家，但其著述對史學界的震撼力肯定跨越本世紀與下世紀。目前不少史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他的影子，不論他們是否明確地承認他的啟發力。Foucault注重文化與政治的交接點，故特別留意文化中的權力問題。他透過分析人類知識以了解權力的運作，尤其著重破譯各種論說中的語言文字所隱含的意義和代表性，以探究權力運作的技術。他不從國家立法過程或階級鬥爭去看權力，而將注意力放在語言符號的表達上。在他眼中，語言不僅反映社會現實，也是權力的工具或因素，有改造現實的媒介作用(Hunt，1989：17)。既然語言和文化是一方力量統御他方力量的工具，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便常有互相作用的關係，而兩種文化的二分法便不再有效了(Hunt，1989：14)。文化與權力既然息息相關，文化史與政治史，社會經濟史也難以截然分開了。這樣，Foucault就為社會史或經濟史未能兼顧文化範疇所造成的範式危機提供了一條出路(O'Brien，1989：26)。

如果說社會理論對社會史和社會經濟史研究有所裨助的話，與文化史關係最密的學科該是人類學了⁽⁵⁾。人類學極看重文化的現象，認為禮儀、節慶等能令社群的價值系統持續留存，不應簡單地被視為脫離社會現實的憑藉而已。在方法論方面，人類學家

(5) 關於人類學對中國社會史和婦女史研究的影響，見葉漢明，1985。

C. Geertz 和 P. Bourdieu 尤為新文化史學者所推許。前者以解讀語言符號為文化人類學和文化史的核心工作(Geertz, 1973)；後者對「習性」(habitus)一概念多所發明。所謂「習性」，是個有持久慣性的心理系統，標示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慣常的狀態，尤其是一種先天的傾向；「習性」也有社會性的一面，是行動的基礎，行動者是社會分子，有其結構性的地位(Bourdieu, 1977: 1, 72, 73, 83, 95, 214n)。Bourdieu認為「習性」既由社會所決定，也決定人們對社會的看法、理解、和感性認識等(Bourdieu, 1984: viii, 1, 170)。由Bourdieu所引發的是對語言表述的解構工作，目的在尋繹各種論說的產生方式、過程、和變化，以揭示有關觀念形成的背景及所受的影響。以上兩套人類學方法——揭示語意的解讀技巧以及揭示論說如何產生的解構技巧，皆為新文化史學者所採用(Hunt, 1989: 10~13)。

總括而言，無論是當代「年鑑學派」學說、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交流史的新視角、或來自Foucault及文化人類學的啓示，都標示著一種重視語言符號的文化史研究趨勢。由於語言符號對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意義和作用，新文化史家遂呼籲從事解讀或解構工作的學者培養一種分辨差異的能力，注意社會不同組別的歧異性，發展出較具區分性的理論，以對不同社會組別運用社群和禮儀加強其地位的方式有敏銳的解釋力(Desan, 1989)。一些以前常為人所忽略的社會組別如少數民族、同性戀者、婦女等遂被提到研究的議程上，而性別等區分社群組別的界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注視。在新文化史學者眼中，性別是文化和社會分化的關鍵界線之一。如不討論性別問題，任何文化觀都不算完全(Ryan, 1989: Desan, 1989)。

事實上，西方在六、七十年代的婦女史研究，以及較近期的性別分化研究在文化史方法的普及和發展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婦女史和性別研究也成了新文化史的前線，在美國尤其如此（Hunt, 1989: 18）。J. W. Scott, N. Z. Davis, 及C. Smith-Rosenberg等即為這方面較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她們均以性別為一文化的表述系統，將性別史與論說的分析勾連起來（Davis, 1975; Scott, 1988; Smith-Rosenberg, 1985）。在這方面，Foucault的影響顯而易見。婦女史雖非其研究範圍，但他以性為論說的產物，認為性是歷史上可變的具體經驗等看法（Foucault, 1978），肯定對專研婦女史的新文化史家有啓發作用。此外，Foucault從權力技術的角度審視文化所發揮的統御力量，以及被統御的一方如何從屬化，這就為文化的政治史提供了分析的工具。一種解釋從屬者如何形成的文化史於焉構成。不能忽略統御與從屬現象的婦女史和性別史當然可從Foucault的方法中汲取靈感。另一方面，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當然是婦女文化史家的重要分析工具。Smith-Rosenberg 就曾以人類學和文學的分析方法尋繹有關男性與女性神話的不同構造，以示性別如何帶出社會變遷的影響力及權力的作用（Smith-Rosenberg, 1985: 45）。

二、香港婦女研究述評

對人類學者而言，香港曾是個很好的研究「基地」。E. Anderson, M. Freedman, E. Johnson, A. Sankar, J. Stockard, M. Topley, B. Ward, J. Watson, R. Watson 等都曾以香港為據點。此外，還有不少長駐香港的業餘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以及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成員等對鄉村禮俗風土懷有濃

厚興趣。他們的研究成果和著述非常豐碩。由於殖民地政府採以華治華和不干預鄉村事務的政策，香港成爲最能保存中國傳統鄉俗風習的地區之一，也爲專研中國小傳統的人類學者薈萃之地。殖民地處境中的中國文化當然有一定的特色，而香港在迅速都市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中國化、西化、或香港本土化等問題，都是文化調適與文化交流的研究項目。

在這種文化的傳承與變遷、融合與分化的發展中，婦女作爲文化載體、調適主體、及交流與整合的媒體，其在香港及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實不容忽略。下文所評介的論著正是關乎婦女的文化價值取向和婦女作爲文化傳導者和傳統繼承者的角色。在香港這個中國大陸與外界、中國移民中不同類別、中西文化、以及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中，婦女在文化的流傳、溝通、和整合，在家庭和社會生活、風土信仰、民間習俗、神話、及宗教禮儀中的角色，以及有關的物質文化特性等都是婦女與文化交流這個引人入勝的領域中值得開展的研究項目。

(1) 早期婦女移民的生活經驗

在中、港關係方面，香港作爲一個與珠江三角洲相依的地區，其在文化和社會經濟上的重要性實在值得關注。在這方面，中、港二地間的人口移動尤爲重要研究課題。不過，令人感嘆的是，早期大陸婦女移入香港的歷史中充滿無數悲慘的故事。婦女被賣爲妓、妾、婢等的悲劇就是其中部份內容。中國，尤其是華南地區的連年災荒，帶來了窮困，也令犯罪活動增加，其中不少涉及擄拐和逼人爲奴婢的案件。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著者可說是可兒弘明的《近代中國の苦力と豬花》(1979) (6)。該書對販

(6) 該書以前似未受到應得的注意，現已有中譯本(可兒，1990)，相信流傳可以更廣。

運中國婦女人口的現象、時代背景、制度、和後果有頗為詳盡和認真的分析。可兒可說是最早利用香港保良局檔案這類珍貴資料的學者，他的研究雖只專注於販賣往海外的中國婦女，但由於香港同時是被拐女性的轉運站和接收地，這本關於中國婦女淪為被賣往海外的「豬花」⁽⁷⁾的著作，實際上也觸及香港婦女史的範圍。

繼可兒之後引用保良局檔案的學者是冼玉儀。他在撰寫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1989) 一書時，採用了檔中關於東華醫院的部份，但也留意到保良局本身在保護婦女、拯救被拐者方面的角色。在1991年6月的亞洲歷史學者國際協會研討會上，冼氏提交的論文就集中討論保良局的設立與香港保護婦女的慈善事業背後的父權觀念、家長意識、和殖民主義中的權威思想，也涉及父權家長制與人身買賣制和家內僕役制的關係(Sinn, 1991)。

在買賣婦女的問題上，葉瑪麗(M. Jaschok)的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 (1988) 一書則集中討論「妹子」的制度。所謂「妹子」，就是被賣為婢的少女。這種制度曾長期盛行於中國內陸和香港。富裕家庭中往往蓄養了大批「妹子」，讓每個子女各有專責的婢女照料。大戶人家的女子出嫁時，也把近身的「妹子」帶入夫家，這些被稱為「妝嫁妹」的陪嫁「妹子」除繼續照料女主人外，還供男主人家差使用，直至適婚年齡，才由主人安排外嫁。「妹子」當中也有被男主人納為妾侍或賣為娼妓者。

(7) 賣到海外的中國男子粵語俗稱「豬仔」，女子則可稱作「豬花」。

不難想象，在香港這個華洋雜處的社會中，中國人的人身買賣制會引起外國人的反感。令人奇怪的是，殖民地政府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間嘗試廢止「妹仔」制時，竟遇到極大的困難 (Great Britain, Mui Tsai Commission, 1937)。一個主要的阻力來自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這些紳商、買辦、或洋人助手出身的菁英分子認為中國的蓄婢制度帶有慈善性質；如無此制，不少年青婦女將因家貧而淪為娼妓。對於這個吊詭問題，可兒和葉瑪麗的書都有論及。前者的分析主要依賴檔案、文獻資料；後者在評價「妹仔」制度、香港社會的婦女地位、以及反蓄婢運動之時，也根據訪問「妹仔」後人的口述材料整理出一些生動的婢女生活個案史。

另一位香港史研究者許舒 (J. Hayes) 經多年搜集，積累了一批珍貴的買賣和轉讓香港及華南婦女和女童的文獻、契據、尺牘範本、便覽手抄本等原材料。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名為“Women and Female Children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to 1949 : Documents of Sale and Transfer” (1990) 的文章中展示了有關資料的內容，其中包括從清代以至本世紀五十年代的賣女契，買妾婚約，許女為妾契、夫故賣女約、永遠繼賣親生女的契約，轉讓育女帖，轉讓生女帖，送女帖，送花女帖等。這些原始資料大多從新界區搜得，是販賣和轉售婦女人口為養女、妾侍、「妹仔」或童養媳的習俗長期存在的證據。

直至五十年代，「妹仔」制度仍然存在，但對這制度的關注和批評則可遠溯至世紀初。到了三十年代，香港反對「妹仔」制度的人士多次發起廢除童奴和蓄婢制的運動。這些積極分子當中也有著書立說的，其中H. L. Haslewood 夫婦撰成*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一書(1930)，麥梅生則編了《反對蓄婢史略》(

1933)。這些著作至今仍為有關學者所引述。及至七十年代，對有關專題的興趣又再度興起，引用的材料也括檔案、舊報刊、政府官報等。一位業餘的香港史家——施其樂牧師(Rev. Carl Smith)就根據報紙等資料，寫成“The Chinese Church, Labour and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一文(1981)，重建當時英國議會、香港政府、基督教反蓄婢會、商會、和工會等環繞「妹仔」問題而發生的互動關係。

此外，不少學者也重視女性移民(包括婢女和自由身份者)與其故鄉間的連繫，並追溯其來源地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例如，前述可兒弘明的書中，就有關於華南社會經濟情況的章節；而葉瑪麗也繼續研究香港不婚女傭的生活，尤其是她們的來源，以及移民香港前在國內的成長經歷、地位和社會關係等。她在1984年的一個研究工作進度報告中，申明婦女的自覺意識是她的立論前提。她發覺許多立志不嫁的「自梳女」在作出決定時是有意識的、自由的、自願的(Jaschok, 1984)。婦女的自主性不僅是她研究的主題，也是她評價其他學者著述的尺度。這從她對J. Stockard 的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一書(1989)的書評(Jaschok, 1990)可見一斑。Stockard 所研究的雖是華南的「不落家」或「遲落家」婚俗，但她的材料不少來自香港老孀的身世自述口述報告。她們都來自「不落家」婚俗流行的區域，多從事繅絲業勞動而取得經濟上的獨立。書中也記述她們在三十年代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下華南絲業衰落後移居香港的生活情況。

這類傳統婚制的反叛者來港後成為著名的女傭群，被稱為「媽姐」或「順德媽姐」。對這種婦女的抗婚行為、工作經驗、和

人口移動有興趣的學者為數不少。著名人類學家M. Topley，就是最早研究婦女抗婚與廣東絲業的關係(1975)的學者之一。其後A. Sankar (1978a ; 1984 ; 1985) 繼起專研移居香港和新加坡的獨身婦女所成立的「齋堂」組織。這種組織往往與佛教或道教有關。Topley 和Sankar 均留意到「齋堂」的宗教背景。Topley就曾與許舒合作撰文追溯先天道與「齋堂」的關係，以及該教派的中國大陸背景(1968)。Sankar則採用個案研究法，訪問了一批她稱為「獨身婦女——家傭——尼姑」的結拜姐妹，進一步指出以宗教家庭制組成的「齋堂」強化姐妹的關係紐帶，也為離鄉別井的獨身婦女提供穩定的生活支柱、財政保障、安全感、和友伴、並將她們的生活方法合理化(1978a)。

(2) 民俗學和通俗文化

在民間宗教方面，婦女向來在有關活動的活躍參與者和受庇護者中佔一大部份。對傳統中國中包括大多數婦女的文盲百姓而言，民間宗教在他們生命中的角色和象徵意義值得細加研究，以闡明社會低下階層的心態和精神生活。這類問題在文字傳統中往往難以看到。例如，許多關於「天后」神話的口述傳說都暗示她和不婚婦女有特別關係。曾致力於中國俗文化研究的J. Watson 指出，部份婦女認為天后為反抗父母要她下嫁一個年紀大的男子而自殺，而天后崇拜中的某部份很可能承認自殺是一種合法的死亡方式。

J. Watson 又指出，天后崇拜對男性與女性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另一位人類學家B. Ward 也認為民間表演藝術對女性與男性觀眾所傳出的文化信息也許不同。這是她多年觀看香港地方戲表演的所得(1985)。然而，在香港民俗學的領域中，引起較多學

者注意的還是哭喪和哭婚的習俗。這類哭歌只由女性唱出，因而體現了一種代代相傳而又充滿創造力的獨特女性文化。早在1969年，張正平就已把新界西北農村婦女所唱的哭歌輯成《哭歌子詞》一書。同時，可兒弘明也致力於採集香港的民歌，後與其他學者以日文寫成「香港農村の民間歌謠」一文(1976)，其中包括對婦女哭歌習俗和歌詞的分析。在張正平、可兒弘明等人的研究基礎上，C. F. Blake 再深入分析哭歌中埋怨父母、辱罵媒妁、詛咒夫家等的內容，撰“Death and Abuse in Marriage Laments : The Curse of Chinese Brides”一文(1978)，以發掘哭歌中有關社會文化、生活經驗、及儀式的理絡結構資料。

此外，不少長駐香港的英國官員/學者如H. Baker、許舒、夏思義(P. Hase)等都是民間節日儀式的長期觀察者，他們的記載也有一定的價值。Baker 就注意到新界新娘常在婚禮上慟哭，因為對女人來說，結婚就是與娘家割離、置身陌生人之中，一切從頭開始，再艱難地重新建立關係和安全感的痛苦經歷(1981)。當然，有人把哭歌視為一種民間藝術的表現方式(譚達先，1988)，但也有不少學者對其社會及文化意義有興趣。最近，夏思義在其“New Territories Poetry and Song”一文(1990)中，就根據其長期對香港農村生活的研究，分析哭歌的內容，並把哭歌與山歌等其他體裁作比較。

衆所周知，客家婦女最善歌。對客家婦女素有研究的人類學者J. E. Johnson在重建一位中年客家僱傭勞動農婦的生活史時，也同時記錄了她所唱的歌詞(1984)。歌中不僅包括婚姻等一般主題，也有丈夫出國謀生的句子，生動描述了華南地區大量男工出洋後留下妻子長期獨處之苦況。在另一篇名為“Grieving for

the Dead, Grieving for the Living: Funeral Laments of Hakka Women”的文章中，Johnson 討論客家婦女擅長的另一類歌曲——喪歌，分析歌中所抒發的感情及其隱含的社會文化意義(1988)。

(3) 方言/地域社群及階級的文化

客家人是個特別的方言群，他們的風俗習慣異於廣東人。人類學者對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六、七十年代時J. Pratt 及E. Johnson等已對新界客家村的婚姻、家庭、宗族、移民等問題作過研究(Pratt, 1960; Johnson, 1977)。有關婦女的描述也常出現於人類學者對客家婚禮的著述中。香港的客家婚禮是人類學者的熱門觀察對象和研究專題。V. Garret 的觀察報導(1980)和 Berkowitz 等合著的*Folk Religion in an Urban Setting: A Study of Hakka Villagers in Transition* (1969)即為有關記述的代表。後者更涉及婚俗禮儀的變化及其對婦女的含義。

其他方言/地域社群中的婦女生活和生活方式也是駐港民俗學者的研究對象。Garrett 對鶴佬婚禮的觀察報告(1987)就特別提到婦女在典禮中的角色。遺憾的是，對香港方言/地域社群中婦女和文化的系統研究尚未成形。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討論。例如一篇關於潮州人的人類學博士論文就只有一節和擇偶有關的文字涉及婦女(Sparks 1978)。另一篇關於福建人的博士論文則特闢一個專論福建婦女的部份(Guldin, 1977)。這個領域的開拓不僅對有區分地研究香港不同社群中婦女和文化有幫助，也有利於中、港方言/地域群間的比較研究。例如，在上述那篇討論福建文化的論文中，作者Guldin就指出福建婦女在香港比在大陸更能自立，皆因香港的福建婦女往往在男人出洋後有長期自立的生活經驗。

生活史或生命歷程史的編撰方法當然對生動、詳盡和具體記錄不同方言群、地域、社團、年齡或職業組別中婦女的真實故事有裨助。這種揉合歷史學和人類學方法的普通人傳記，取材自實地採訪考察、參與/觀察者的報告、口述記錄、和文字資料等，重視個人的歷史背景和社會關係，也不忽略內心世界的描述（Sheridan & Salaff, 1984 : 11~22）。除了上述的葉瑪麗書中所載的個案史外，M. Sheridan 和J. Salaff 合編的*Lives : Chinese Working Women* (1984) 書中也收集了好些生活史。後者涉及的人物類別尤多，從老一輩的獨身婦女——家傭——尼姑、村婦、客家僱傭勞動婦女，以至較年輕的女工都包括在內。採訪的對象雖是工作婦女，所討論的問題卻不限於婦女的經濟狀況，也涉及她們為維持傳統及以家庭和男性為中心的生活所承受的壓力(Sankar, 1984 ; Davis-Friedmann, 1984 ; Salaff, 1984)。

Salaff在另一篇關於七十年代香港女工的文章中指出，當時香港的年輕婦女正徘徊於傳統與現代及中國化與西化之間的歧路上。她們的經濟能力和工作經驗改善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但中國傳統與近代工業化及殖民地的結構相結合，強化了家庭中男性家長的角色，從而限制了工作婦女地位的提高，也使她們仍然受制於家庭義務。

(4) 親屬與家族制度

中國是個以家族為社會核心的文化體系，研究中國婦女文化史的學者當然不能忽略婦女在家族中的角色、身份、和地位。早在六十年代，H. Baker已為香港的婚姻與家庭的研究奠定基礎（1964），並指出婦女無法成為宗族的正式成員，她們也絕少參加宗族的禮儀活動（1968 : 51）。近年在香港婦女與家族及親屬制度等有

關課題上用力最深、研究成果最著的要算是R. Watson了。她在新界廈村經多年觀察和採訪，搜集了極為豐富和珍貴的資料，經整理後陸續發表的研究報告涉及村社、親屬制、階級、及性別等專題。她的報告尤長於人類學的「厚描」法，使有關人物及現象巨細無遺地展現出來。R. Watson 雖以親屬制度及階級結構的交叉關係為研究主線，對性別問題的關注卻非常明顯。據她觀察所得，婦女常被置於男性宗族甚或任何宗族之外。她們不入祠堂，不參加公開或正式的宗族儀式或活動，沒有財產繼承權和分產權，對嫁妝的處置權也受限制 (R. Watson, 1985 : 107, 126, 129n, 135 ; 1986)。相近的觀察所得也載於J. Watson 的研究報告中。他也提及新界婦女不用祭拜宗族祖先，她們死後也不受族祭 (J. Watson, 1982b)。

婦女在宗族中地位之低是肯定的，但婦女也能在親屬間建立一定的關係網。R. Watson 認為姻親關係對婦女(尤其是社會下層的婦女)有特殊的重要性。對男性而言，地主/商人階層常利用姻親關係維持其優越的社會地位，但農民階層中的男人則往往只活動於男方宗族圈子中，卻由婦女聯繫姻親。對這些婦女而言，姑嫂、妯娌等組成的女性親屬圈為她們提供了安全感和認同的基礎。也正是這些女性親屬共同承擔了生、婚、喪活動中的實際工作。由於婦女處身在父系和夫系宗族之外，也由於男女間存在各種顧忌，難以發展友誼，女性姻親圈便成了婦女間建立情誼紐帶和活動網的主要領域。這種圈子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肯定是邊緣性的，但卻有一定的功能，也就對男女雙方都有利了 (R. Watson, 1981 : 1985 : 133~136)。

中國傳統家族中常見的妯娌間糾紛雖然很少在R. Watson

的個案中出現，而婦女婚後疏遠同胞姐妹和同性友好的普遍程度也值得商榷，但她對親屬制度的研究中顧及階級、身份和性別的分野，確能令複雜的問題得到細緻的、區分性的處理。這種分辨歧異性的眼光和能力也表現在她最近對僕役制與親屬制的研究中。在一篇名為“Wives, Concubines, and Maids: Servitude and Kinship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1900~1940”的文章中，她說明中國家庭內不僅存在兩性分化的情況，其女性分子間的利益衝突其實也非常普遍。妻、妾、婢等在階級、身份、和地位上的層級分別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文章仍以廈村的實地考察為主要資料，輔以香港政府對「妹仔」問題的調查報告，以對僕役制和親屬制下各類婦女的境況作比較研究。重心是妾和婢及其與男戶主的妻和女的地位比較(R. Watson, 1991)。該文與前述葉瑪麗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一書同是探討香港家庭內部的婦女最低層的重要著述。

(5) 文化變遷與社會經濟的衝擊

中國的傳統不僅存於香港的鄉村社會中，事實上，文化的延續與變化正吊詭地共存於今日香港生活的各個方面中，這正是多個研究範圍的學者間互相呼應的共同主題。人類學者利用他們的參與/觀察者研究法的專業訓練，已對社會經濟發展對文化的衝擊作出敏銳的考察。例如，D. H. Bracey在她對新界客家婦女的研究中闡析，這些婦女已背窩藏於閨房之內的中國女性理想模型。她們在丈夫出洋工作後必須建立較強的女性團結力量，以及負起較重的經濟任務。諷刺的是，當她們的經濟地位逐漸改善，以及在男人從海外歸來後，婦女的工作需要便減弱了。她們的自主性和女性團結性也隨之降低(1979)。在另一個香港客家婦女的

個案研究中，E. Johnson則認為工業化和都市化雖改變了婦女對養兒育女的態度和行爲，卻未必有助於生育率的降低。反之，經濟的穩定和財產的擁有竟配合傳統宗族和村社組織的持續存在而令多子多福的價值觀維持下去(1975)。

(6) 中西文化交流

傳統信念的確極難改變。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張妙清所作的36個中國婦女個案研究顯示，文化價值可以持續地影響婦女的態度，情況並不因外在的生活而改變(Cheung, 1979)。香港婦女外表上可能表現得很西化，但她們內心及潛意識中的傳統烙印和中國化程度也許連她們自己也意想不到。畢竟，西化、甚或現代化往往隱含著強加於中國身人上的外來價值觀，因而容易招致抗拒。殖民地體制內的西化尤其如此。在這方面，殖民地社會中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間、以至中外婦女間的互動關係，實在是個急待探討的題目。最近出版的新書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1991d) 正是一項應時的貢獻。作者S. Hoe 嘗試重建香港西方婦女經驗中的一段「失落了的歷史」。由於婦女的經歷在香港歷史中幾乎全無記載，Hoe 必須多方搜羅公私檔案、書信、日記、訪問等資料。這些西婦中有曾是反蓄婢、反蓄妾、及反纏足運動的積極分子。此書與何艾齡的 *Clara Ho Tung: A Hong H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1976) 等同類著作將使香港婦女生活史和有關種族文化交流的傳記資料更加豐富。

三、發展方案

從上述的論著評介可見，在香港婦女的社會文化史方面，尚有許多重要的研究領域未開展或僅觸及皮毛而已，而某些概念問

題仍待解決。在香港中外婦女間文化交流方面，她們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尤值得注意。有關的研究範圍不應只限於西方婦女對中國婦女的感染，還須包括中國婦女對西方婦女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婦女的文化主體性對西方婦女在矯正其種族優越感和以施恩者自居的傲慢態度上所發生的影響力。西方學者如葉瑪麗和S. Hoe等均已注意到這個問題。進一步的研究可從深入發掘資料方面入手。例如要追尋個人在這些互動關係中所起的作用，口述歷史和生活史的方法也可用於西方婦女的研究上。那些和中國「姐妹」們共同努力，參與反蓄婢、妾及反纏足運動的分子就是值得細緻剖析的例子。在這方面，大量存在而未經採用的傳教士檔案，尤其是當中有關女傳教士工作的原材料，定能為研究帶來突破。

在文化變遷方面，有關的課題包括西化/現代化的衝擊、傳統所受現代化的挑戰、代溝、青年文化和次文化的興起等。近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已開始對通俗文化、次文化、和本土文化作系統研究⁽⁸⁾，但婦女與文化變遷仍是個尚待開拓的領域。

中國傳統親屬制在香港，尤其是鄉村地區的持續存在及其漸變的發展一直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注視的焦點；而婦女與親屬制度的課題早已為人類學和歷史學界列在研究的議程上（J. Watson, 1982 : 615 ; 1986 : 282~283）。R. Watson的廈村調查是個以香港為「基地」的典範性研究。我們仍須發掘其他例子，以建立比較研究的基礎。有關妻、女、妾、婢等家內女性的地位層級仍需更多的資料證據。例如，妻的地位當然高於妾，但如果妻子的地位主

(8) 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有蔡寶瓊、呂大樂等社會學家。

要基於其生子的功能，那麼不育妻子的地位又如何？只生女的妻子又如何？繼室、「填房」等的地位如何？香港直到七十年代才廢除妾侍制度，在這種殖民地法制與中國傳統父權家長制的微妙關係下，婦女家內地位所受的影響為何？如果殖民地統治給香港帶來某些特色，那麼R. Watson 專駐香港某村的當代微觀考察所得，是否可以概括華南地區自清末到民國以來的情況？這些都是未來的研究者須要解答的問題。

此外，婦女與家庭生活周期觀念、財產權、經濟依賴性，女性團結和友誼、社群生活等都是同樣重要的課題。雖然在二、三個方言/地域群的社會網絡、習俗、婚姻模式或婚姻外的選擇、家庭生活和親屬共同體、以及節慶禮儀等方面的研究，已有某些成果，我們仍須對更多方言/地域社群(如上海人等)的生活方式，及其聚落文化等有關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對於新近移居香港的大陸婦女，也可用採集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她們適應環境的策略、以及男女在文化調適方面的角色比較等問題。婦女外移離港的問題也同樣值得關注，但目前對有關問題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成果仍未多見⁽⁹⁾。J. Watson 的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1975) 一書對婦女略有所提。有關問題仍有待更專注的學術研究作更深入細緻而嚴謹的探討。

(9) 1991年初，香港新界社團聯會婦女中心與 8個新界婦女團體合作進行了一項有關1997年前過渡期婦女意向的問卷調查，內中包括移民意向等問題，參見葉順興文，1991。近日香港天主教的公教教研中心也計劃進行「過渡期香港天主教婦女價值取向」的研究。

另一方面，要重建早期中國婦女移入香港的歷史，就該仔細爬梳珍貴的保良局檔案，這個龐大的資料群保存了局方在保護婦孺難民的工作中所登錄的受理人士資料如人數、口供、調查報告等，對淪為誘拐對象、妓女、奴婢等女移民的社會經濟背景和心理狀態、生存技巧等，提供了極為具體、翔實、詳盡的一手原始性直接資料。研究「妹仔」問題者可參考這批檔案，研究娼妓問題者更須從這個資料群中取材。利用這個檔案配合其他文件、調查報告、及採訪記錄，當可整理出中國及香港的娼妓制和活動網，並可觸及妓女的心態、意識等問題(葉漢明，1991)。目前關於香港娼妓史的學術專著甚少，除了對有關條例的分析(Miners, 1984)外，還有施其樂牧師對中西妓女，情婦等的資料提供(Smith, 1969; 1988: 184~186, 198)，以及 S. Hoe 論西方婦女對中西妓女的雙重標準的新近研究(1991b)。但有份量的深入研究仍付闕如。

在女性的性文化方面，研究成果尤其缺乏⁽¹⁰⁾。正如Foucault及I. Illich 等所說，人類的身體也有其歷史(Foucault, 1978; Illich, 1982)，而對不同性別的身體的認識和看法，又往往受到文化的影響。故性與性別問題實息息相關。性在生物性和愛慾問題上的文化結構性意義正是性別研究的環節，任何缺乏性文化項目的女性文化研究都不算全面。

女性宗教文化也是婦女文化史的重要課題，向為文化史家和人類學家所重視，但對香港地區的研究仍有待發展。除了佛、道齋堂以及婦女天后崇拜的特殊性等研究外，這個領域仍有很多空白部份。例如，重要宗教組織和團體中的婦女角色和地位、信仰

(10) 在有限的研究中有女性同性戀問題的探討，見 Lieh-Mak, et al, 1983。

系統和意識形態、禮儀的意義和作用等方面，仍未有嚴謹的學術性研究面世。但在基督教團體與婦女問題方面，施其樂牧師已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材料搜集工夫。他在撰寫教會和傳教史的同時，整理出好些關於婦女與教會、中國婦女基督徒與西方女傳教士的關係等資料，顯示西方婦女在促進香港女子教育、改善婦女地位、為中國婦女樹立事業女性的榜樣等方面的貢獻 (Smith, 1976 ; 1977 ; 1985) ，為進一步專研香港婦女與宗教問題的學者提供了門徑。

雖然民間宗教和通俗文化特別引人注意，人類學者對這方面的興趣尤濃，但仍有一些鮮為人觸及的地方，例如女性民間藝術家或表演者、通俗文學及傳說中的女英雄或女主角的形象等。此外，婦女教育和識字率方面的研究也不足。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一篇碩士論文中，作者楊秀珠以生命歷程史的方法，編寫了6位定居香港的廣東老婆婆的生平，環繞近代中國平民婦女教育的主題，縷述她們的學習經驗、所接受的正規和非正規教育、謀生技術、處事方法、社交技巧等 (1989) 。我們從中可以掌握一些女子教育方面的資料。

在婦女主唱的儀式歌方面，雖有較多學者注意，比較研究卻仍付闕如。這種體裁也見於中國其他區域和世界各地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上海南匯縣文化館，1988 ; 1989 ; Jordan & De Caro, 1986 : 509~511) ，值得進行比較分析。城鄉婦女的比較研究也急須開展。香港一方面急速都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另一方面卻因殖民地政府對華人鄉俗採不干預政策而長期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傳統價值，這種矛盾現象和香港鄉村婦女與城市婦女的地位對比等問題實在值得細究。

當然，在急速都市化的壓力下，香港的鄉村區域正逐步縮小，人類學家的基地也愈來愈狹少了。對現存鄉村婦女生活的記錄和研究也顯得逼切起來了⁽¹¹⁾。口述歷史和生命歷程史的編錄工作必須繼續開展。俗文化資料的搜集和保存也成了當前急務。除了口頭資料如歌謠、民間故事傳說、及掌故外，實物如掛畫、衣飾、工具、古建築等物質文化史料，以及民間用書，家庭便覽等文字資料也不容忽略。對搜求民間文化資料不遺餘力的許舒多年來從本地舊書攤購入了大批通書、對聯、燈謎、成語及格言小冊子、禮儀便覽、家禮帖式、契約程式、治家酬世大全、尺牘、童蒙讀本、簽語、會社勸捐冊、徵信錄、故事書、勸善書、報紙、婦孺淺解、婦孺信札、女經、木魚書等 (Hayes, 1980 : 168~183)。其中不乏和民間婦女家庭生活、教育、行為規範、家中地位和角色等問題有關的材料。

當然，通俗文化與菁英文化並非截然可分，女性文化與男性文化間的分野也極微妙。如果將A. Gramsci的「文化霸權」概念 (Gramsci, 1971) ⁽¹²⁾ 引申到兩性文化的領域，有關問題便不僅牽涉菁英文化對通俗文化的統御或滲透程度、階級結構如何影響文化表現等，還包括婦女文化從屬於男性文化的程度。後一課題實涵蓋了婦女史和性別研究，以及二者間的關係。如果說Gramsci

(11) 例如，為興建機場，大嶼山北部十數條村即將消失。為保存歷史記錄而進行的口述歷史計劃已展開，據初步調查所得，該區農耕工作一直由婦女擔任，男子大部份以航海謀生，可說是個女耕男航的社會，頗為奇特。

(12) 另參見R. Williams的理論。他將文化視為階級的統御和隸屬 (Williams, 1977 :

誇大了菁英分子對群眾的文化統御，及低估了社會下層對菁英「文化霸權」的抵禦和回擊能力。那麼，我們也不能輕視女性文化本身的獨立、自主性、和抗爭性⁽¹³⁾。權力的運作可以是雙向的，權力也並非經常是或必然是壓制性的，它可以是創發性的，這正是Foucault權力觀中饒具啟發性的一點⁽¹⁴⁾。

Foucault從各種論說中看權力運作的方法也可用於文化雙向交流方面。例如，在香港婦女運動的歷史上，西方婦運分子、中國婦運分子、與社會下層婦女等各自的立場及彼此的關係，就是一個上佳的研究項目。葉瑪麗的研究方向之一正是反蕃婢運動和反立妾運動中西方積極分子的論說。這些熱心人士往往不自覺地以西方婦女的經驗來看非西方婦女的解放，自以為代表所有女性，可以建構一套國際性的女性主義理論，並以之強加於非西方社會上，而不意識到這些理論也可能帶有霸權世界觀和先驗色彩⁽¹⁵⁾。只有當非西方女性的主體經驗受到尊重，時空的歧異性受到注意，以及不同文化體系的婦女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時，反思、檢討、批判、和重建西方女性主義學說的工作才有建設性的開展

(13) 近年發現的湘南「女書」(趙、宮，1990)就是一個女性文化自足性的極端例子。當然，這種自成一格的特殊性也可視為無法躋身主流文化而侷處一隅，劃地為牢、與世隔絕的狹隘性、隱秘性、和侷促性。

(14) 不過，我們也應把權力和權威分別開來。婦女當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權力，尤其是非正式的權力。這種力量也許很重要、很有影響力，男人卻常擁有權威，可以將權力合理化。事實上男性對女性的統御往往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例如，父權家長制對婦女有統御和庇護的雙重性質，正因為它有合法性的權威力量(Rosaldo, 1974: 17, 21)。

(15) 葉氏在1991年3月假中文大學舉行的「性別與社會：太平洋沿岸的經驗」研究會，以及同年6月假香港大學舉行的亞洲歷史學者國際協會研討會上的發言都包括有關的批判。

理論重新建構的一個前提是對性別和文化歧異性的承認，及對有性別和文化基礎的主體性的尊重。目前不少女性主義理論家都提出，對非西方文化、社會和婦女的研究，可以補救西方中心學說的缺陷；這些研究必須以非西方婦女為自決、自主的歷史主體，而致力於重建多種社會中的婦女生活史。在這方面，文化史和人類學的方法裨助至大。

其實，本土婦運分子的立場也值得深究，她們之中有上層社會的菁英分子、保良慈善家、宗教人士等，其立論的前提所受傳統價值或西方思想的影響、她們的社會聯絡網、與解放對象的關係等仍有待細緻的分析。她們曾以個人或團體成員的身份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起過作用，而她們自己也同時發生了變化。發掘這批人士的背景資料，不僅有助於了解本土婦女運動的發展。也有助於香港社會史的重建。在這方面，集體生平學的方法正可大派用場。這種方法通過人物志、傳記、訪問等資料對社會活動家、改革家等人物的背景進行分類的群體分析和系統調查，尋繹其人際關係、所屬的社會階層、所在地域、學歷、政治立場等，以解釋有關權力、利益、集體行為等現象⁽¹⁶⁾。

在資料方面，我們欠缺的是系統性的人物志或人名辭典。有見及此，一個由冼玉儀發起、葉瑪麗和S. Hoe等統籌的大型人物志編纂工作正在展開。這部名為*An Annotat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Women, 1841~1990*的中英文工具書將突顯出香港史上各個種族社群中婦女的角色和貢獻，涵蓋香

(16) 關於集體生平學的方法及其應用範例，可參閱“Prosopographie”，1970。

港公、私領域內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活動，所用的資料包括公私檔案。長居香港的業餘歷史學者施其樂牧師充任該計劃的顧問。在他數十年的研究中，積累了大量資料摘錄，也建立了一套人名和各種專題的索引系統，內中不乏婦女史的有關線索，彌足珍貴(Yip, 1991)。

無論是婦女人名索引、人物傳記生平學、或生命歷程史，都可令歷史中經常面目模糊，無名無跡的婦女顯現出來。生活史和生命歷程史強調婦女的主體經驗和自覺意識，故都是重建婦女史或人類歷史的基礎工夫。香港既有充滿豐富個人資料的保良局檔案，也有工作婦女和關於平民婦女的教育等的口述傳記群，還有S. Hoe引用各類材料撰成的香港西婦集體傳記，以及包括名人以至洋人情婦等各階層人士的個人傳記，婦女史的資料其實不少。而香港久已成爲人類學家的研究據點，故與人類學關係密切的文化史基礎最固。任何毋視這豐富的學術資源而生硬套用先驗的理論或機械的方法以研究香港婦女或文化史者，只能寫出貧乏乾癟、空有骨架而無血肉的作品。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對知識和論說中權力作用的重視，將對檢討香港婦運理論及批判社會菁英保護婦女的立論方面有所啓發。然而，文化與法制，文化與經濟等的交接點也不容忽視。新界婦女至今仍未有財產繼承權，就是一個深具研究價值的問題。中國傳統的父權家長制、人身買賣制、財產法等對近代香港婦女地位的影響既是社會史也是文化史的課題。經濟方面，有關婦女生產活動、經濟獨立等問題的資料其實不少。除了描述客家婦女、女工、女傭等的生活之外，還可專研她們的生計問題。有關研究項目還包括「媽姐」或「住年妹」（長住雇主家的受薪女僕）等的薪金及

家務勞動價值的估計 (Sankar, 1978b)、從「齋堂」的經營管理及收支預算所見的理財法、婦女所組織的互助金融信用機構、從各種經濟活動中所顯示的勤儉、自尊、獨立自主或自足的價值、以至帶企業精神的經濟人格、及商業文化等。如果說Foucault的權力觀念未能兼顧利益問題，婦女文化史家對該問題亦不宜忽略。

四、展望

總括而言，婦女文化史的領域很廣、發展潛力無窮，而目前僅處於起步階段而已。在1985年出版的*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書的總結部份，編者之一的E. Rawski 在指出今後的研究方向時提及：

婦女文化和婦女在文化流傳中的角色也是極具研究價值的課題。婦女文化在某些主要方面與中國的主流文化相異，這種現象反映出一個著重男性血統的社會中婦女的邊緣地位 (Johnson, et al.: 1985, 413)。

在香港方面，長期以來，人類學者及業餘地方史研究者和資料收集者對婦女文化史發展所打下的根基尤須珍惜。新文化史的符號解讀、文絡解構、權力詮釋等技巧亦已開始受到注意。今後的研究必須顧及文化主體和文化產物兩方面。在方法上，除了訪問、實地觀察、及對有關論說作語言符號的分析以探求主體的立場、動機、經驗、感受、和所受影響之外，還須對主體所背負的傳統、所身處的環境和社會繼續作調查、考察和推論。換言之，我們必須掌握主客兩方面的辨證關係。畢竟，文化是由社群所擁有，透過傳統代代相承而存於制度之中的共同資源；這些具有符號表徵的文化資源常為社群中的組成分子、流傳系統中的參與者

、和活於制度下的個人所重新解釋、重新塑造和更生 (Link, et al., 1989 : 3) , 而女性主義理論的重建也將是主體性探討和結構分析雙管齊下的成果。新文化史理論家L. Hunt 說得好, 歷史學家實無須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之間, 或人類學和文學理論之間作出抉擇(Hunt, 1989 : 16) 。

書目：

- 于 沛(1989)：「文化、文化學和文化歷史學」，《史學理論》，2：151~168。
-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上海市南匯縣文化館編
——(1988)：《哭喪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1989)：《婚喪儀式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王德華(1953)：《近代中國文化史略》。台北：正中書局。
- 可兒弘明(1979)：《近代中國の苦力と豬花》。東京：岩波書店。
- (1990)，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等(1979)：「香港農村的民間歌謠」，《文學》，38。
- 柳詒徵(1932)：《中國文化史》。南京：鍾山書局。
- 馮天瑜(1989)：《中國文化史斷想》。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 張正平(1969)：《哭歌子詞》。香港：佑華出版社。
- 陳安仁(1939)：《中國近世文化史》，三版。長沙：商務印書館

- 。
- 陳登原(1962)：《中國文化史》。台北，世界書局。
- 麥梅生(1933)：《反對蓄婢史略》。香港：香港蓄婢會。
- 梁啓超(1963)：《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四版。台北：中華書局。
- 楊 豫(1989)：「『新史學』的困境」，《史學理論》，1：26～37。
- 楊秀珠(1989)：「近代中國的平民婦女教育：一個生命歷程史的探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教育)碩士論文。
- 葉順興(1991)：「新界婦女在九七過渡期意向問卷調查報告」，《性別研究資訊》，2：5。
- 葉漢明(1989)：「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研究中心性別角色研究計劃「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論文。
- 葉漢明(1991)：「香港婦女史原始資料介紹——保良局檔案」，《性別研究資訊》，1：2～3。
- 趙麗明、宮哲兵(1990)：《女書——一個驚人的發現》。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錢 穆(1957)：《中國文化史導論》，台五版。台北：正中書局。
- 。
- 譚家健(1988)：《中國文化史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譚達先(1988)：「新界民間哭喪歌」，《深圳民間文藝》，1。
- Revel, J. (1989)，梁其姿譯：「導言」，載梁其姿編譯《年鑑史學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1～7。

- Baker, Hugh (1964).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spe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Week-end Symposium, May 9-10, pp.27-31.
- (1968).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 (1981). *Ancestral Images Again: A Third Hong Kong Album*. Hong Kong: SCMP Publications Division.
- Berkowitz, Morris I., Frederick P. Brandauer, & John H. Reed (1969). *Folk Religion in an Unrban Setting: A Study of Hakka Village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 Blake, C. Fred (1978). "Death and Abuse in Marriage Laments: The Curse of Chinese Brides." *Asian Folklore Studies* 37, 1: 13-33.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 R.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 R.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 Bracey, Dorothy Heid (1979). "Econom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the Hakka Wom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4, 2 (Fall): 52-60.
- Cheng, Irene (1976).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

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Fanny M. C. (1979). "Self-perception, Cultural Norm and Development--Case Studies of 36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 1: 357-362.
- Davis, Natalie Ann Zemon (197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Friedmann, Deborah (1984). "Village Wives--Granny Cheung: Peasant." in Sheridan & Salaff, 1984: 71-75.
- Desan, Suzanne (1989). "Crowds, Community, and Ritual in the Work of E. P. Thompson and Natalie Davis," in Hunt, 1989: 47-71.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rret, Valerie (1980). "A Hakka Wedding in Hong Kong, May 1979,"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125-128.
- (1987). "A Hoklo Weddi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7: 112-254.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 tr. Q. Hoare & G. N. Smit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Great Britain, Mui Tsai Commission (1937). *Mui Tsai in Hong Kong and Malaya*. London: HMSO.
- Guldin, Gregory Elliott (1977). "Overseas' at Home: The Fujianese of Hong Ko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Hase, Patrick (1990). "New Territories Poetry and Song," in Ting & Siu, 1990: 20-32.
- Haslewood, Hugh Lyttleton, Lt. & Mrs. (1930). *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 The Mui Tsai System*. London: Sheldon Press.
- Hayes, James (1990). "Women and Female Children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to 1949: Documents of Sale and Transfer," in Ting & Siu, 1990: 33-47.
- Hoe, Susanna (1991a).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b). "Queen's Women: Western Prostitutes in Hong Kong, 1841-1931,"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Jun. 24-28, Hong Kong.
- Hunt, Lynn, (1989).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Hunt, 1989: 1-22.
- ,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llich, Ivan (1982). *Gen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Jaschok, Maria (1984). "On the Lives of Women Unwed by Choice in Pre-Communist China: Research in Progress," *Republican China* 10, 1A: 42-55.
- (1988).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Book Review: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by Janice E. Stock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1: 139-140.
- (1991). "Women and Women's Studies in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Society: The Pacific Rim Experience," Mar. 21-22, Gender Research Programm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n 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Johnson, David, et al., eds. (1985).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ohnson, Elizabeth (1975). "Women and Childbearing in Kwan Mun Hau Village: A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Wolf & Witke, 1975: 215-241.
- (1977). "Households and Lineages in a Chinese Urban Village."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 (1984). "Great Aunt Yeung: A Hakka Wage Laborer," in

- Sheridan & Salaff, 1984: 76-91.
- (1988). "Grieving for the Dead, Grieving for the Living: Funeral Laments of Hakka Women," in Watson & Rawski, 1988: 135-163.
- Jordan, Rosan A. & F. A. De Caro (1986). "Women and the Study of Folklore," *Signs* 11, 3: 500-518.
- Lieh-Mak, F., et al. (1983). "Lesbianism in the Chinese of Hong Kong,"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2, 1:21-30.
- Link, Perry, et al. (1989). "Introduction," in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 P. Link, et al.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pp. 1-13.
- Miners, R. J. (1984). "Stat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Hong Kong, 1857 to 19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143-161.
- O'Brien, Patricia (1989). "Michel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 in Hunt, 1989: 25-46.
- Pratt, Jean (1960). "Emigration and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 A Study of Marriage in a Hakka Villag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Eastern Anthropologists* 13: 147-158.
- "Prosopographie" (1970). *Annales* 25, 5: 1029-1239.
- Rawski, Evelyn S. (1985).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Johnson, et al., 1985: 399-417.
- Rosaldo, Michelle Zimbalist (1974).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Woman, Culture,*

- and Society*, ed., M. Z. Rosaldo & L. Lamphe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7-42.
- Ryan, Mary (1989). "The American Parad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Order," in Hunt, 1989: 131-153.
- Salaff, Janet W. (1976). "Working Daughters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Family: Female Filial Piety or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Family Power Structur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9. 4: 439-465.
- (1981).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Wage Earners in Hong Kong," in Sheridan & Salaff, 1984: 146-171.
- Sankar, Andrea P. (1978a). "The Evolution of the Sisterho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rom Village Girls' Houses to Chai T'angs in Hong Ko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1978b). "Female Domestic Service in Hong Kong," in *Female Serva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L. Tilly et al. Ann Arbor: Michigan Occasional Paper in Women's Studies, 1.
- (1984). "Spinster Sisterhoods," in Sheridan & Salaff, 1984: 51-70.
- (1985). "Sisters and Brothers, Lovers and Enemies: Mar-

- riage Resistance in Southern Kwangtung,”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1, 3/4: 69-81.
- Scott, Joan Wallach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eridan, Mary & Janet W. Salaff, eds. (1984).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inn, Elizabeth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On Patriarchal Concept of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Po Leung Ku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Jun. 24-28, Hong Kong.
- Smith Carl T. (1969). “Ng Akew, 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 Women’,” *Chung Chi Bulletin* 46: 13-17, 27.---
- (1976). “Notes of the Earliest Missionaries in Hong Kong,” *Ching Feng* 19, 3 & 4: 24-28.
- (1977a). “The Early Hong Kong Church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Patterns,” *Ching Feng* 20, 1: 52-60.
- (1977b). “The Protestant Churc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 in 19th Century China,” *Ching Feng* 20, 2: 109-115.
- (1981). “The Chinese Church, Labor and Elites and the

-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 91-113.
- (1985).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A Sense of History (Part I),"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 144-264.
- Smith-Rosenberg, Carroll (1985).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 Sparks, Douglas Wesley (1978). "Unity is Power: The Teochiu of Hong Ko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Stockard, Janice F. (1989).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 Ting, Joseph S. P. & Susanna L. K. Siu, eds. (1990). *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 Topley, Marjorie (1975).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Wolf & Witke, 1975: 67-88.
- & James Hayes (1968). "Notes on Some Vegetarian Halls in Hong Kong Belonging to the Sect of Hsien-T'ien

- Tao (the Way of Former Heave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 135-148.
- Ward, Barbara (1985). "Regional Operas and their Audience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in Johnson, et al., 1985: 161-187.
- Watson, James (1975).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2a).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a Quarterly* 92: 589-622.
- (1982b). "Of Flesh and Bones: The Management of Death Pollution in Cantonese Society," in *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 ed., M. Bloch & J Par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55-186.
-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Johnson, et al., 1985: 292-324.
- (1986). "Anthropological Over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cent Groups," in *Kinship and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ed., P. B. Ebrey & J. L. Watson, pp.274-292.
- & Evelyn S. Rawski, eds. (1988).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tson, Rubie (1981). "Class Differences and Affinal Relations in South China," *Man* (N. S.) 16, 4: 593-615.

----- (1985).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3, 4: 619-631.

----- (1986). *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 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Wives, Concubines, and Maids: Servitude and Kinship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1900-1940," In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ed., R. S. Watson & P. B. Ebr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31-255.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Margery & Roxane Witke, eds. (1975).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ip, Hon Ming (1991). "Profile of a Local Researcher: The Rev. Carl T. Smity --His Works, Knowledge, and File-Index Research System," *Gender Studies: News and Views* 2:8-10.